

中国历代散文选注

郭预衡 主编

隋唐五代散文选注

林邦钧



中国历代散文选注 ● 郭预衡 主编

隋唐五代散文选注

● 林邦钧 选注
●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鄢 琨

封面设计:罗 丹

隋唐五代散文选注

郭预衡 主编

林邦桷 选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湘潭县印刷厂印刷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875

字数:440,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814-X

I·421 定价:20.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总序

郭预衡

中国古代散文浩如烟海，散文选本也日渐其多，新的选本应有新的特色。以这套《历代散文选注》而言，突出的特色，是选文比较全面，从中可以窥见各个历史阶段的散文特点。

首先，先秦这个历史阶段，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时周朝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处士横议，诸子争鸣。百家之文，放言无惮，纵横驰骋，最有时代特征。不仅儒墨名法，互相驳辩，各家内部，也有论争。尽管这时各家各派之文，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见萧统《文选序》），但实际上，也都言而有文。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门重视文采，最为明显。老子虽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但其书五千言，几乎都是“美言”，不能谓之“不信”。其他各家之文，包括不讲文采的墨家和法家，也都有文采可观。

先秦这个历史阶段，文史各科尚未区分，而各家行文都尚文采，这是此期文章的一大特点。

其次，汉魏六朝这个历史阶段，是古代散文发展变化、汉语文章特点更加突出的时期。

汉代初年，天下始定。萧、曹为政，以黄老为宗。法网疏阔，思想尚未一统。这时的文章作者，学杂管、商，或兼纵横。贾谊、晁错等人的文章，大抵都有先秦的遗风。

到了武帝以后，文章开始变化。这时出于政治需要，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这对文章的发展变化大有影响。但当武帝之世，黄老之学尚盛，儒术并未真正独尊。所以司马迁仍然能够“发愤”而写“谤书”，淮南王刘安仍然能够私集宾客而有所论著。司马相如等人作赋，也未免“虚辞滥说”。

但到元帝以后，由于儒学逐渐成为官方之学，文章乃渐染儒学之风。正是因此之故，世人论文，乃谓大汉文章，东京不如西京。

到了汉魏之际，文章又有变化。这时儒学统治动摇，异端思想输入，文苑出现了小型的百家争鸣。

首先是曹操为政，力倡“通脱”，建安诸子为文，乃有“想说什么便说什么”（鲁迅语）的新的特色。

再到魏晋之际，阮籍、嵇康，“师心”、“使气”，长篇大论，蔚为“一代鸿文”。再到晋宋之际，陶渊明“忘怀得失”，王羲之“抗怀物外”，饱经篡乱，而为文平淡，这样的文章，也是新的特点。

在这以下的几个世代，易代更为频繁，文人更无“特操”，思想更加“通脱”，为文也更不拘忌。有的文章甚至“不阡不陌”，“不文不句”（张融：《门律自序》）。再加上这时出现了几个“文雅的庸主”和一帮“柔媚的词臣”（鲁迅语），为文更趋偶俚，终于形成了骈体。这样的文章，刘师培以为“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是最能体现汉语文章之特色的。

但与此同时，南北文章，也非一律。南方多尚辞采，北方则尚征实。《北史·文苑传》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虽不尽然，大体如此。

再到隋唐五代，又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时物极而返，文章又由骈趋散。

隋时黜文尚质，唐初斫雕为朴，广开才路，广开言路。这对文章的发展变化，影响甚大。魏徵诸人的直言极谏，已经不同于

六朝之文。四杰行文，虽仍骈体，而书生意气，也不同于六朝词臣。当然，唐代文章的更大变化，是当开元盛世转入衰世之时，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等人，都已感到“世教沦替”，为文“救时劝俗”，“立宪诫世”。

这时文风复古，已成一种趋势。萧颖士说：“仆生平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赠韦司业书》）为文“希古”而“不近俗”，复古的倾向是明显的。但唐文真正复古，还在安史乱后。这时一些文人学者，不仅为文忧世，而且颇思兴利除弊，救世济时。在永贞和会昌两次朝政改革期间，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翱、皇甫湜以及孙樵、杜牧、李德裕等，所为文章，都是干预时政、积极用世的。

但朝政改革连续失败，为文论政，也无力救弊起衰。这时的文章，便不仅指陈时弊，而是进而批评君权专制。从刘蛻、皮日休，到陆龟蒙、罗隐，写了更多的杂文小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罗隐。鲁迅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批判的内容极为广泛。这是唐代散文崭新的特点。

下至五代，军阀割据，四民皆商，文化扫地。但在军阀的幕下，也产生了一些卑弱的骈俪文字。世积乱离，而文尚骈体，也值得注意。

宋辽金元，是“古文运动”延续转变的一个历史阶段。

经过唐末五代之乱，宋时又归一统。宋初广开才路，广开言路，超过唐代。而且太祖以武臣而得帝位，特别裁抑武臣而优遇文人，于是便有更多的文人得以入仕。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文人参政，十分积极。尤其是当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时期，许多文人学者如欧阳修、王安石以及苏氏父子，都是参与了朝政改革的。所谓宋代的“古文运动”，也如唐代，是同朝政改革密切相关的。这时的古文作者，不仅写了大量的论政之文，而且针对当时军事失利，也写了大量的论兵之文。这是前代不曾有的。唐代的古文

家以谈兵著称者，只有一个杜牧，而宋代则从尹洙、苏洵，到南宋的辛弃疾等，都有专门谈兵的论文。

还有，宋时国家虽不富强，而文人待遇比较优厚，法网宽松，思想比较自由，生活情趣也比较广泛。这时的文章作者，往往兼擅诗词、书法和绘画，亦或兼擅经学、史学、金石之学。所写的文章，也有新的特色。

当然，到了南宋，理学流行，这对文章也有影响，所谓“理学腐语”，也是一代“文弊”。但南宋偏安，国家多难，救亡图存，仍多慷慨论事之文。

辽、金两国，与宋并立，两国文章，都受宋文影响。理学影响尤为明显。王恽挽刘祁诗云：“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既说出了金文的特点，也包括了辽文的特点。下至元代，也不例外。可以说，元代之文，既继承了唐宋的文统，又继承了宋儒的道统。这样的文章，又有新的时代特征。

明代之文，初继宋元，后则多变，是文风多变的一个历史阶段。

《明史·文苑传》说：“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研习，学有本源。”这里盖指宋濂、王祿诸人。其实，不仅明初如此，此后“台阁”之文，也是上承元代的“治世之音”。文统和道统，大体相同。

明文之变，是从“七子”开始的。七子倡言“文必秦汉”，一向受人非议，其实文风复古，实亦出于不满现实。为文复古，不免泥古；但语及时事，亦慷慨之至。前后七子，无不如此。

明文更大变化，始于公安袁氏。其先行者，还有李贽。从李贽等人开始的新的文风，首先是打破了“伊洛”的道统。这在当时，也是突破了官方哲学的传统。李贽之讲“童心”，公安之讲“性灵”，所为文章，都有崭新的思想特征。

明代的社会，变化也大。天子从极权专制，到不亲政事，政

事由宦官独揽到内阁专权，再加上西北边患，东南倭患，内外交困。中叶以后，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城镇生活的变化，世风、士风都有变化。这对文章的影响甚大。此时小品文章的大量涌现，都与社会的变动有关。

到了明之季世，文人学者又有所“反思”，有人曾将社会危机，归罪于狂人李贽。欲挽明社之亡，乃求助于伦理纲常。于是宋儒理学，又被崇尚。这时为文，又讲经世致用，与公安、竟陵有所不同。

清初学者之文，也是主张经世致用的。这样的文章，主要产生于明清之际。在大清王朝稳定了中原地区之后，出现了三代“太平盛世”，这时一面开科取士，一面实行文化专制，文章的发展变化也面临新的形势。从康熙到乾隆，都是“太平天子”，文化水平甚高，文化政策亦高，其影响文章的发展，前代帝王有所不及。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产生了历时甚久的桐城派的“盛世之文”，这是前世少有的。

桐城派的“盛世之文”，是和清代的“太平盛世”相终始的。到了晚清末世，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文章也面临巨大变革的前夕。从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文章出现了新体。再到“五四”运动前后，文章的巨大变化，更是史无前例的。

这部《历代散文选注》，始于先秦，迄于“五四”之前，历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从中可以概见。本文所谈者，只是一个轮廓，至于每个历史阶段作家作品的具体特点，已见于各本的前言，这里不再多谈。

一九九七年早春于北京

前言

隋朝年祚不长，二世而亡，其过渡性质的历史地位，与秦相似。

然而隋秦又有所不同。秦朝的政治与文化，都实施专制，而隋初则奉行开放：秦逐客卿，而隋则兼容并蓄南北朝文人；秦焚书坑儒，而隋则广搜南北公私书籍秘藏，分类编目。所以“秦世不文”，而隋则颇有文章。由于作者来自多方，文章也较多样。隋文帝不喜词华，其《伐陈诏》无论内容和文辞，较之六朝骈文，都有斫雕为朴的倾向。即使“意在骄淫”的隋炀帝，所作《营东都诏》，也“词无浮荡”（《隋书·文学传》）。此外，有李德林、薛道衡之辈的歌颂新朝之作；有李谔上书，请革文华的献计帮忙之章；还有刘炫、王通等人的牢骚怨愤之文。其中王通的思想学说和文学观点对唐宋金元古文家的影响颇大。

六朝文风，艳丽之极，柔靡之极。物极必反，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隋文帝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通鉴·陈纪十》），李谔上请革文华书后，“诏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四方。”（同上）但六朝文风，积重难返，不是靠一纸诏令所能革除的。李谔上书，不过想恢复殷《盘》周《诰》的佶屈聱牙之古而已，并无理论的建树和创作的实绩，故收效不大。但这已预示着六朝文风的改革势在必行。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近三百年的战乱频仍、南北分裂的局面，对南北文人兼收并蓄，这又为南北文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有利条件。

此外，隋废九品中正的选举制而实行科举取士。这对短命的隋

朝本身影响不大，却对改变有唐一代散文作家的群体组成，影响颇巨。

唐代是我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创作高峰。清代编辑的《全唐文》（其实不“全”，后又辑有《唐文拾遗》、《唐文续拾》）1000卷，收3000余名作家的各体文章18400多篇，其字数比前此历代文章的总和还多2倍多。其成就之辉煌可见一斑。与前代相比，唐代散文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唐代散文的作家群体

唐朝历代统治者重视文治，文化教育普及发达，所以唐代散文拥有空前广大的作者群，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而作家的主体，则由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中下层文人取代了六朝的豪门士族。世事沧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六朝豪族纷纷败落；唐太宗、高宗为抑制山东豪门世族，抬高李氏宗族的地位，两次重订氏族谱牒；加上唐承隋制，实行考试选举，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世卿世禄的门阀荫袭制度，改变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极大地激发了寒士布衣入仕从政的积极性。他们渴望通过察举、征辟、考试等跻身政坛，一展才能，建功立业，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利益。与此同时，他们的入主文坛也成为势所必然。

六朝政局，变化倏忽；官场仕途，升沉不定。不少文人或玄谈佯狂以远祸；或不满时政而隐逸，或沉溺酒色而苟安，不同程度地远离政治，而把诗文创作当成“纯艺术”来把玩，自我消遣娱乐。再囿于残山剩水的半壁江山和宫廷苑囿的狭小天地，其诗文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贽《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自在情理之中。

唐代文人则不同。他们之中，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洞悉世

情，了解民生，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他们或赴京应试，辗转山川；或供职朝廷，干预时政；或从军边陲，建功立业；或入幕为宾，造福一方。他们的诗文，干政议政，反映时弊民瘼，不仅用以抒怀言志、娱性悦情而已。

创作主体的变化，必然带来创作作品的变化。正是由于唐代作家群体某种程度的“平民化”，所以唐代散文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通俗化”倾向。

唐代散文的“通俗化”倾向

骈句作为一种散文句式，渊远流长，而其发展成为骈文，完全成熟，并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则在六朝。贵族文人为掩饰其文章内容的空虚苍白，一味在骈文创作中追求华美，玩弄修辞，堆砌典故，拼凑音韵，使这种美文的创作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

有唐一代，骈文创作，贯穿始终，而变逞才尚华为切实尚用，变典雅华美为朴素平易，变晦涩为晓畅是其总体的发展趋势。如以直言极谏著称的魏徵，所作《十思疏》说理析义，设喻取譬，条分缕析，明白如话，几不用典。以讽谕委婉著称的陆贽，所作奏议，指切事情，纤徐委备，匡救规谏，纤微毕到，浑灏流转，明白晓畅。他们的骈文，风格不尽相同，而极少用典，读之让人几不觉其为骈文，则是两者的共同特点。李商隐是唐代骈文的集大成者，他的骈文善于融六朝徐、庾和中唐陆贽的骈文之长。所作《为濮阳公陈情表》笔力雄健，情致酣畅。而《祭小侄女寄寄文》则风格迥异，其中融入了作者落魄飘零，亲友稀绝的身世之悲，琐事常语，娓娓道来，情切意深，凄婉动人。从上述所述，不难看出唐代骈文“斫雕为朴”的通俗化倾向。

骈文之外，唐代作家还用“古文”进行散文创作。他们在充分汲取先秦古文及六朝骈文和当时生动活泼的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以单行散句为主，长短自由，更适合得心应手地表情达意的散文

体式，即所谓的“古文”。这种更为通俗、更易普及的散文载体的形成，大大促进了唐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在古文创作中充分汲取骈文之长，可以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为例。他斥骈文，倡古文颇力，但他的文章常用对仗排比，连类引发，骈散相间，长短错落，一气贯注，舒卷自如。如他讽刺谄媚势利之徒说：“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送李愿归盘谷序》）如此刻划，穷形极相，入木三分。又如他的《进学解》，这样形容自己作文的广取精华：“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不仅评论精当，而且多用韵语，铿锵而有金石声。他还从鲜活生动的口语中提炼出“细大不捐”、“动辄得咎”（《进学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等形象通俗的语言，至今还流传人口，成为成语。

以上是唐代散文形式的通俗化，而内容方面的通俗化，则主要表现为干预现实，贴近生活。举凡朝政得失，社稷安危，将相贤佞，战事胜败，时弊民瘼，都是唐代散文表现的主要内容。如陈子昂的《谏用刑书》针对武后的严刑峻法而发，刘贲的《贤良对策》极言中唐的宦官擅权之害。李商隐的《为濮阳公檄刘稹文》、杜牧的《原十六卫》是就中唐的藩镇割据而发论献计。韩愈的《官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刻剥渔劫百姓的苛政猛于虎、毒于蛇。类似的内容、这样的深度，为唐代以前的散文所罕见。元结、柳宗元、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一些小品文，用嘻笑怒骂、幽默讽刺的笔法，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触及到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

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小说传奇的兴盛，散文中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作记，表现他们的生活，反映他

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日见其多。如韩愈的《圯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沈亚之的《冯燕传》、《表医者郭常》及李翱的《杨烈妇传》等等，其创作宗旨虽不尽相同，其本意或许并不在立传，但文中所表彰的传主均为工匠、医者等平民百姓。殷侗的《窦建德碑》所记碑主，乃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尽管作者不免天命论的局限，然而他还是写出了窦建德树在平民大众心中的丰碑。这样的内容，唐代以前，仅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中。

唐代散文的发展与创新

对诸多的散文体裁和表现手法，唐代作家都能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或创新。这是唐代散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的重要标志。

如山水游记，严格地说，唐代以前还没有。《水经注》只有在为山水作注中夹杂片段的描述，《与朱元思书》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富春江景色，都算不上真正的山水游记。元结的《右溪记》文字简洁，意境幽妙，在以景写心方面，为柳宗元导夫先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不仅“牢笼百态”，写出荒郊山野景色的艺术个性，而且寄寓了他的幽愤和悲思，成为游记文学中之骚体，从而奠定了游记在散文史中的地位。

序文这类文体，前人多以流连光景，刻划山川，间以叙说事由，抒发感慨，率多浮浅。唐人的序文，丰富了品种，诸如宴序、赠序、集序、诗序、图序、杂序等，千姿百态，蔚为大观。还拓展了序文的功能，可以议政（韩愈《送董邵南序》、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可以传人（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可以记游（白居易《三游洞序》），可以论文（韩愈《送孟东野序》、皇甫湜《顾况集序》），可以论学（韩愈《送丘闲上人序》），几乎无事无情不可入序，而且手法变化多端。如韩愈的《送石处士序》与《送温处士序》，人相关，事相同，而行文布局，用笔

虚实，迥然不同。《送石处士序》由从事与乌公的两问两答之中，道出石生之贤，乌公之求贤若渴。《送温处士序》作于其后，且温生由石生为媒介而入乌公之幕，颇难落笔。韩愈只字不提时事之艰、佐军之要及乌公求士之贤，而只以伯乐空冀北之马为喻，于空际撰语，暗颂乌公之礼士得贤。作者忽作幸语，忽作怨语，怨乌公攘夺其友，极写己之不悦，而幕主与宾客之贤则已俱在不言之中矣。这正是作者运笔的巧妙处。

墓志碑铭，古已有之。历叙家世，铺排阅历，歌功颂德，华而不实，提供史料之外，几无文学审美价值。而发展到唐代，碑志已成为传记文学之一支，其文学品位大大提高。如韩愈的墓志巧于摹写，传神写照，手法不一，风格各异。其《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王适诤妻一段，运用小说心理刻划和对话等手法，将其“怀奇负气”落拓疏狂的个性描绘得维妙维肖。其《柳子厚墓志铭》夹叙夹议，有敬佩、有同情、有愤慨，其中融入了作者的身世之慨，曲折淋漓，唱叹有情。韩愈有的墓志，不仅酷肖其人，而且酷肖其文：表樊绍述则似樊氏之文；志子厚则有子厚之风；志孟郊则拗折岸奥酷肖孟郊。如此墓志，非“谀墓”者所能为。

《谢上表》例为感谢迁秩的官样文章，而元结的“谢上”，如同谏疏，不仅反映和同情民瘼，而且针砭吏治，建议择吏“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难怪洪迈感叹“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容斋随笔》卷十四）。他的《道州刺史厅壁记》也一改一般厅壁记罗列置州沿革、迁黜年月的程式，而专讲刺史之“公直贪狠”，黎庶之“存亡休戚”，兼有史论和政论的性质，实为一篇“刺史戒”。难怪吕温称道此文“彰善而不党，亦指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道州刺史厅壁后记》）。

再如寓言，这种文体，早已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著述中，但大都未

能独立成篇。柳宗元的寓言能将深邃的哲理性、强烈的政治性、生动的描绘与幽默的讽刺融为一体，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同是寓言，他的《三戒》，只写动物不写人，而以物喻人；他的《螾蝓传》，先写螾蝓，再写贪官，最后绾合两者，写法颇有变化。

总之，唐代散文不仅起八代之衰，而且集八代之成，并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唐代散文演变的轨迹

唐代享祚几近三百年，其间兴衰治乱的变化甚巨。受其影响，唐文之变也颇多阶段，可由古文运动的发轫、酝酿、兴盛、衰落为线索概而言之。

何谓“古文”，已见前述，而所谓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对六朝骈文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它的内容革新是与唐代政治的改革要求相因应的。古文运动之所以发轫于武后新政时期的陈子昂，酝酿于安史之乱后的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之辈，形成高潮于永贞改革前后和“元和中兴”之际的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正说明了这一点。

唐代文章之变化，始于贞观年间，这是与唐太宗的广开才路、广开言路分不开的。直谏之文是当时最有时代特征的文章，傅奕、魏徵、马周等人纷纷直言极谏，作者之多、作品之众、影响之大，前所未有。行文虽沿用骈体，但尚切实，汰浮华。

其后是永徽至延和年间（650—712）。四杰的文章叹“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王勃《滕王阁序》），怨“徒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涧底寒松赋序》），以怀才不遇的怨愤为基调，他们的骈文抒怀泄愤，气势壮大，有汉赋影响；辞藻宏丽，存六朝余习。武后改制，朝政有变。既任酷吏，严刑峻法，剪除异己；又任贤能，兴利除弊，巩固政权。所以当时既有李峤、崔融、苏味道、宋之问之流的权幸所作的歌

功颂德、柔媚典丽的入时之文；又有陈子昂等人批评酷刑、指陈时弊的切谏之文。陈子昂的奏疏指事造实，直言无忌，陈述王霸，纵横慷慨，方诸汉初，可拟贾谊；比于贞观，凌乎魏徵。因此，尽管他的“道”与古文家的“道”内涵有别，文风也不同，后人还是尊之为古文运动的开创者，陈振孙称其“诗文在唐初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韩退之《荐士》诗言‘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虚语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六）

开元年间（713—741）是唐代的极盛时期，典丽宏瞻是与之相应的文风，领袖当时文坛的则是位列宰辅的张说、苏颋、张九龄。张说长于碑志，叙事写人，运思精密，剪裁得当，质实典重。张九龄的制诰颂赞，“得王言之体”，以典雅富赡、婉而有章的风格反映开元盛世的恢宏气象，有别于六朝的骈体专以协宫商、饰词藻为能。作为文坛领袖，他们在转变文风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天宝至贞元年间（742—805）就政治而言，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就散文而言，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时期。建中元年（780）的科举策问始用散体，说明文体改革已呈水到渠成之势，这一时期前有李华、萧颖士、贾至、元结、独孤及，后有梁肃、柳冕、权德舆等致力于文体改革。他们从理论上阐述，创作上实践，互相揣摩，奖掖后进，为古文运动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理论上他们主张明道宗经复古，但片面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忽视了它的审美作用，对屈宋贬抑过甚，而且他们的儒学不纯，创作成就除元结之外大多不高，所以未能形成改革高潮。

永贞至长庆时期（805—824）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其标志是人才辈出、理论建树、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当时，藩镇叛乱割据、宦官擅权，两税法流产，于是出现了永贞改革。与之相适应，文学上出现了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和以韩柳为领袖的古文运动。永贞

元和期间，力倡古文的除了韩柳之外，还有李观、李汉、李翱、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刘禹锡、吕温、白居易和元稹等。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韩柳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都有较系统明确的论述，以指导古文创作的实践。他们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更重要的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干预现实，面向人生，不仅仅载孔孟之道，明圣贤之说而已。对古文创作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他们也提出了“含英咀华”、“旁推交通”、“陈言务去”、“文从字顺”、“气盛言宜”、“意尽便止”等等具体要求，对规范古文创作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各体创作均有佳品，颇多创获，风格独特，成就斐然，被奉为楷模。

宝历至大中时期(824—859)，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是由盛而衰的时期。前一时期的“元和中兴”不仅未能根本解决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问题，而且又增加了牛李党争、南北司党争(朝官与宦官)问题。这一时期虽出现过“会昌中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古文运动也随着政治改革的失败而退潮，无论是作者人数和成就都不如前。骈文又呈复炽的势头，代表作家有李商隐和温庭筠等，影响及于宋初的“时文”。古文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裴度、李德裕、牛僧孺和杜牧等政治家，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杜牧。他才兼文武，“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另一类是作为韩愈再传弟子的孙樵和刘悦等文人，他们虽有济世拯物之志，却缺乏韩愈、柳宗元那种不屈不挠的信念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没有那样卓越的才能，只能在行文的怪奇上着力，他们的创作虽各有可观，但成就远不足以振起颓势。

咸通至天祐年间(860—907)是唐朝的季世，涌现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一批穷愁之士。作为唐代散文的殿军，他们的《谗书》、